从格致书院到岭南大学*

鲍静静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高中初三级体系的完成, 是其教育专业化的重要标志。广东地区基督教教育顶端的岭南大学的出现, 开启这一并不顺利的历程。在只有中等教育程度的格致书院、岭南学堂和岭南学校时期, 中外教育者们为它的产生、发展几经努力, 形成其非教派性和中国化的特征。

关键词:格致书院; 岭南学堂; 基督教大学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49 (2015) 01-0068-07

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专业化以基督教中等教育的发展为始, 以高中初三级体系的形成为最终完成, 其中高等教育的出现是至为关键的一步, 这一历程在各地的基督教教育系统中以大致相似的进程完成。但具体到各地域考察, 又各有其特点。以广东省为例, 承担这一重要角色的学校是岭南大学。与其他基督教大学相比, 岭南大学有两个突出的特色, 一是岭南大学虽是由美北长老会广州传道团首先发起, 但是它是一所非教派性的大学, 奠定了它日后发展上的自由度。二是在岭南发展中, 中国人的作用在早期即开始发挥, 且不断增长, 使它最终能够成为第一所由中国人接办的基督教大学。

岭南由于条件的限制, 在 1917 年开办大学之前的时期, 从 1888 年的格致书院到 1900-1911 年的岭南学堂到 1912-1917 年的岭南学校时期, 岭南只是一所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学校, 对于岭南发展至大学后的阶段, 相关研究成果关注度较多。^[1]故而本文考察的时间段主要自 1888-1917 年, 此一阶段中岭南学堂在基督教教育中作为高等教育的预备者, 日后逐渐发展成一所具备初、中、高完整教育系统的学校, 具有代表性, 是一个值得考察的个案。

一、格致书院的奠基与初期分歧

当 1877 年传教士大会上传教士们在争论是否应该举办教育事业作为传教工作的一部分时, 一些有远见的传教士已经开始思考将初期小规模、不成

体系的传教教育发展成具有中高等教育的程度, 山东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是代表之一, 在广州的那夏礼、哈巴安德、香便文是另一个群体, 不过他们共同之处在于都属于美北长老会这个重视教育传教的教派系统。

1869 年 5 月 15 日, 那夏礼牧师给美北长老会的秘书长娄瑞写了一封信, 表达了广州长老会传道团教务会议的一项提议: “希望在广州创立一所高级学校, 这所学校参照我们西方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 让中国人通过西方教育感受到上帝的恩赐。”^[2]这是目前所见资料中最早有关在华南地区建立高等教育设想的提议。那夏礼所记载的这一提议显然是代表了当时长老会广州传教团的集体意见, 据以后的岭南大学相关资料一再追溯, 对此提议最早提出者为香便文牧师, 对此赞同最力者为哈巴·安德牧师, 之后进一步将此一设想变为现实的则是哈巴·安德的推进与实践。^[3]

哈巴·安德牧师 (Rev. Andrew P. Happer) 1844 年来到中国, 来华之初就开始进行教育活动, 在澳门开设一所寄宿学校, 之后的岁月里, 他与夫人不断致力于传教教育事业, 他认为“中国应该有一所基督教教会大学来为整个中国服务”, 1884 年至 1885 年香便文牧师 (Rev. B.C.Herry) 和哈巴安德相继向美国长老会海外差会递交建校报告, 最终获长老会海外差会认可, 并授权由哈巴安德来执行这一计划。1886 年的发起人中的 6 人, 其中 3 人是神职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晚清民国时期广东中等教育”阶段性成果, 项目号: GD11CLS01。

收稿日期: 2014-12-15

作者简介: 鲍静静, 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员，3人是非神职人员，此后27人签名的授权名单中，包括：两名外交使节，一是容闳，他曾是驻华盛顿的中国公使；另一位是杨约翰，原驻北京的美国公使；两位法官，哈里斯堡的西蒙顿和圣路易斯的布雷肯利芝；前美国教育部的高级官员约翰·伊登；6所大学的校长；12位知名牧师，7位宗教杂志的编辑；4名医生。^[4]所以，从一开始，岭南大学就奠定了它的非教派性质。在此后的发展中，长老会虽然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但它的非教派性质为它在之后的发展中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

1888年，学校在沙基开学，80名年青人参加了考试，录取了其中的30名，第一个报名的就是陈子桥的儿子陈少白，日后他成为同盟会的重要成员。教师则只有三人，除了哈巴及其夫人以外，还有一位中国教师，这位中国教师在檀香山曾同哈巴的女婿一起当了三年的教师。第二年又增加了两位中国教师，教师人数达到5人。学校每周上6天课，每天上6节课。此时学校虽定名为“中国基督教大学”，但正如赖德烈所说：“开始的时候，多数书院并没有超过美国的中学。每个学校也仿照美国的办法附设有预科，有时一直往下延续到小学的几个年级。有的虽起名叫做大学，但这种称号与其说是事实的描写，倒不如说是一种雄心壮志和宏伟希望的表现。”^[5]其实此时的大多数以大学命名的学校只是预科，甚至连是否达到中学的程度也值得怀疑。格致书院开办时的情形正符合赖德烈的论断。1890年由于哈巴夫妇重病，学校不得不暂时关闭。对于学校的状况，哈巴也有更多的考虑，他在写给托管会主席布思的信中说：“开始时，广州建校的前景是那么美好。我敢说，还从未遇上过这么好的条件。但是在广州，人们希望提高的是非宗教性和商业性的教育，因而对我来说，是否能在这儿建校仍值得慎重考虑。”^[6]

1893年学校重新开学，由香便文担任校长，但香便文对于传道工作更为热心，他向广州布道团提出以一半时间传道，一半时间从事教务工作，同时他建议将学校与设在花埭的成人和少年寄宿学校（即培英学校）合并，他的提议得到同意。1894年开始上课，教职员共有6人，2名美国人，4名中国人。学校初级部学制两年，学生41人；中级部学制3年，学生42人；大学部学制4年，学生22人。大学部平行开设两类课程，一类是神学课程，

一类是普通大学课程。但大学部的22人中并没有人报名上普通大学课程。此时的学校其实仍是培英学校的变换名称而已，格致书院所设想的英文和科学教育为重，在合并后的学校并无立足之地。

对于和培英学校的合并，哈巴一直不满意。他认为合并后学校的状况不符合当初他捐赠时的设想，并且学校也不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1897年，后来长期担任岭南学校司库的格兰（William Henry Grant）在第二次自费来广州考察后，写道：“一方面本学院应通过布道团招收大部分学生，另一方面本学院的基础是一所主要培训传教士的学校，人们认为进入它会感到十分尴尬。该院既招不足攻读医学和普通大学课程预科班的学生，又不能完全达到布道团建它的要求。布道团的目标主要是开办正规学校，培养多数来自乡村的少年，使他们今后能从事日常的传教活动。而且两个不同班级的学生应有各自的宿舍和娱乐场所。”^[7]格兰的报告引起托管会的重视，在办学宗旨不同的情况下，分歧愈来愈大，与培英分开成为必然，^[8]据简又文的考证，两校分开后，当时两校大致有一种分工协议，格致书院将原有之科学仪器各种移用，致力于科学教育，培英书院则专办素所注重之神学。^[9]学校又回到了哈巴原来的建校设想上来，可惜的是，哈巴已于1894年10月27日去世，未能看到他的理想实现的一天。

二、中学部的建立：南大附中还是南中附大

自1888年学校开学以来，在最初十几年的分歧与争执后，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方针总算确定了下来，学校创办时的英文名称为Christian College in China（基督教学院），1903年3月31日，董事会决定向纽约州大学提出申请，将校名改为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广州基督教学院）。这项提议在1903年5月21日获得批准。中文校名则于1900年由格致书院改为岭南学堂，1912年民国成立后，应民国政府的要求改为岭南学校。

这一时期岭南学校的英文名称虽然是基督教学院，但这时学校实际上并没有大学部的学生在学习。按照学校实际的教学程度，名义上采用大学预科，实际上大约相当于中学的程度。1898年岭南重新作为一所独立的学院开学，由尹士嘉任（O.F. Wisner）监督，学校只有教员3人，学生17人，

1899年钟荣光应聘为汉文总教习，校园搬到花地的萃香园，1900年为避祸，学校又迁到澳门，^[10]1901年三位预科学生毕业，他们是钱树芬^[11]、陈廷甲^[12]和丁远显，岭南完整的中等教育程度至此才完全建立起来。岭南独立发展后，注重英文和西方自然科学的课程成为它不同于一般基督教学校的特色，令学生印象深刻。据第一届中学毕业生钱树芬回忆：（学校）凡自然科学各科目无不齐备，而且各有实验室，实为当时在国内中外公私学校所仅见。^[13]格致书院和岭南学堂时期已经开始开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自然科学课程，并设有实验室，由教师指导实验。地理科并有学生野外实测绘图课程。

1899—1917年大学部独立出去以前，中学部是岭南学校的主体部分。1904年学校由澳门迁回广州，在此后的日子里，岭南终于结束了东搬西迁的历史，在河南康乐村一块风景优美的地区建立了岭南的新校园。1905年开始建筑，1906年岭南的第

一幢永久性建筑—马丁堂落成，它成为岭南校园里的许多个第一：第一所由硬制红砖建起的房屋，以后的岭南建筑，红砖绿瓦成为一种特色；第一所采用钢筋水泥地面的建筑；第一所用捐赠者名字命名的建筑，用捐赠者的名字命名房屋、房间，成为岭南在日后募捐的主要方式之一。

1927年岭南收回自办之前，是西人主政时期，岭南早期历史上的几位西人校长对于岭南的奠基与发展功不可没。

1905年学校有中西教职员10人，学生60余人。1907年尹士嘉回国，由晏文士（C.K.Edmunds）继任监督。1908年在中学以下设备班一班，收容投考程度不佳者。1909年于广州丛桂新街^[16]开办高等小学一所，作为岭南中学的附小，1913年移入校内，并由青年会增设蒙学，至1916年高初两级小学、中学均已完成。1918年大学部有了自己第一届的毕业生，三级体系完成。^[17]1918年岭南附中的教职员中9位西人，7位华人，多数有学士和硕士学

1917年前西人捐助教员住宅表：^[14]

屋名	捐资建筑者	建成时间	居者
第一麻金墨屋	美国麻金墨夫人	1911	葛理佩
希仑高屋	美国希仑高女士	1911	夏活
泽臣屋	美国泽臣先生	1912	晏文士
高礼士屋	美国高礼士医师	1913	林安德
第二麻金墨屋	美国麻金墨夫人	1913	陈辑五
黑石屋	美国黑石夫人	1914	钟荣光
威林宾屋	美国宾纱宛尼大学青年会	1914	黄启明
伦敦会屋	伦敦会屋	1916	白士德
委夏士屋	美国委夏士夫人	1916	梁敬敦
美臣屋	美国美臣先生	1919	不详

岭南西籍校长任职表：^[15]

名称	任职年份	学历	贡献
哈巴安德	1888—1891年任校长	杰弗逊学院、西方神学院、宾州大学医学院	岭南的创办人兼首任校长，主张英文教学和学校办成一所综合性大学
尹士嘉	1893年任教岭南，1899—1907年任校长，1924—1928年回校任文理学院院长。	不详	课程用英文教授，提高学校学术水平，提倡体育运动，建筑岭南康乐校园
葛理佩	1903年任教岭南，1909—1926年中学校长	华盛顿和李大学文学硕士	编写英文课本、组织南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为学校教师 and 行政人员提供办学经验和学校工作的咨询。
晏文士	1903年来岭南任教，1907—1924年任学校监督。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学博士	特别重视科学研究，发展岭南大学部。

历。需要说明的是，此时学校虽已分为大学部和中学部，在师资上仍是互通的，大学部的教师也会在附中上课。

由于许多学生在入学前并未受过系统的西学训练，很多人在预科第一年结束时就放弃了学业，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06年学校开设了一个补习班，

为学生补习更为初级的课程，它的规模越来越大，与两个附属初级学堂互为补充，岭南预科部的生源基础逐渐扩大。1909年学校任命葛理佩（H.B. Graybill）为预科部主任。葛理佩1903年来到岭南，他获得华盛顿和李大学的文学学位，所编辑的英文教材曾作为基督教学校中最为通用的教材之一。

1918年岭南附中教职员情况表：^[18]

姓名	国籍	学历	所授功课	备注
邓勤	美国	文学硕士	经济学	校长
葛理佩	美国	文学硕士	教育学	中学校长
聂	美国	文学学士、格致学士	算学、物理学	
莫丹路	美国	文学硕士、算学学士	算学	
许仲伟	中国	1899年秀才，留学日本	辞章学	
陈德芸	中国	1888年秀才	国学、历史	
鲍令留	美国	文学学士	历史	
白士德	英国	神道学士	宗教学	牧师
侯活	美国	文学学士、格致硕士	生物学	
关恩助（佐）	中国	格致学士	英文、翻译	1906年本校中学毕业生
刘伯棠	中国	格致学士、商科硕士	商科	1909年本校中学毕业生
林天吉	中国	商科学士	商科	先后留学新加坡、日本
罗云飞	美国	农科学士	农牧科	
丽雪	美国	文学学士	英文	
谭锡鸿	中国	农学学士	农科	1911年本校中学毕业生
黄启明	中国	文学硕士	教育学	1908年本校中学毕业生

1906-1907年葛理佩利用回国休假的时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进修一年教育学的课程。为之后在岭南开设教育类科目奠定了基础。^[19]1911年，预科的学制延长为五年，为那些不能继续接受正规教育的人做更充分的准备。由于这种做法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在20世纪初年在其他的基督教学校也采用，例如真光中学就是如此。预科部也正式改为中学部。葛理佩担任中学部主任一直到1926年底，之后由何荫棠接任。

1916年中学部已发展至相当规模，晏文士校长说“学校已有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中学部，我们现在筹建一个规模相当的大学部是极困难的，因为与中学部相比它会相形见绌。”^[20]此时学校有381名学生，其中大学部23人，中学部358人，附属的小学部也有154名学生。学校的主体部分很显然是中学部，至1925年，学校的中学生加上华侨学生为

340人，仍然超出大学生加大学预科生289人的数目。

虽然1906年学校开始招收大学生（当时名称为广学），但是学生经常中途流失，一直没有人完成四年的学业，中学学生的流失率也很高，如1916年班学生，毕业时为17人，其中途离校者有25人。1918年班1915年有30人，1916年只有17人。^[22]初期岭南学堂学生流失的原因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学生出国留学。1901年岭南有第一批中学毕业生，但初期几届的毕业生或者考取广东省官派留学生，1904年广东省首次官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岭南英文备学四年班学生王家鸾就考取广东省官派美国留学生，列第八名；^[23]或者考取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6年班赴清华考试多人；或者自费留学，日后在广东乃至全国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韦恇（慤）为岭南1916年学生，但在岭南只读了1913年一年就赴英国留学。1914年韦的同学关灿堂又赴日本留

1925年岭南学生人数调查表：〔21〕

中学生数	附设小学生数	大学生数	大学预科生数	华侨学校学生数 农科大学兼专修	科生数	总计
263	244	182	107	77	37	910

学。1916年张道深赴美留学，至1918年岭南留美学生超过百人。二是学生转学其他学校，如1913年有何文锦、池庆宽、邓盛宜3人转学至唐山路矿学校。〔24〕三是部分学生不能适应岭南的教学，学生退学者多。四是学生在一定的英文学习后，有机会找到待遇比较优厚的工作机会。如1914年黄文灿、郭瑞坤离校到政府机关任职。这也导致岭南迟迟没有自己的大学毕业生。〔25〕

1917年大学部在十一年后，终于有了第一批的三位毕业生。学校也意识到将大学部的学生混杂在中学部不合适，决定筹备独立的大学部，并成为此后学校的重点，因为学校开办的初衷本身就是大学。但是附属的岭南中学一直在学校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何荫棠1927年12月曾言：“以附中在岭南大学之过去、现在、将来，均占有重要之地位。揆之校史，岭南之发达，实肇基于中学。小学大学随之而生。”〔26〕因此直到20年代末还有人戏称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是“南中附大”，并不是“南大附中”。〔27〕

三、本土化的先行者：华人基督教教育家的介入

岭南大学作为中国基督教大学中第一所由国人收回自办的基督教大学并非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因为岭南的非教派性特征，在其发展中，早期创建者虽多为美北长老会成员，但美北长老会并无固定资金支持，而是由设在纽约的岭南基金会负责筹募基金和加以管理，对于各方力量都善加运用，既包括西方的力量，也包括中方的加入。初期西籍教职员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但华人教职员亦很早即介入教学与管理，为岭南的早期发展作出贡献，其中贡献最大者即为岭南的第一任华人校长钟荣光（1866~1942）。

钟荣光在1937年曾为自己预拟过一副挽联：“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做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唯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

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这副挽联可说是钟一生最精辟的概括。〔28〕其中“唯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一句说明岭南在他一生中占据的地位。

钟荣光早年生活据其学生招观海的记载，钟16岁举秀才，29岁中举人，在科举八股文方面颇有造诣，在广州设大馆授徒，且生活糜费。1895年受甲午战败的刺激，转向新学。1895-1898年间先后办过《可报》、《博闻报》、《安雅报》，与孙中山交游，参加革命，并开始接触基督教，与左斗山牧师等关系密切。1899年在香港道济会堂受洗为基督徒，施洗牧师为王旭初（一作王煜初，王宠惠之父）。该年他接受尹士嘉的邀请，在岭南教授中文，此后他的生活与岭南开始结下不解之缘。〔29〕

怀抱救国之志且在广州有文名、有资产的钟荣光加入岭南，自然不是为了求得生活的温饱。钟在入岭南之初，就作为尹士嘉的得力助手，全面介入岭南的教学与管理。日后高冠天对此有所记述：“方钟先生被聘入校，即定有进行方针，尝谓中国教育未发达，自不能不藉仗外人助力，若徒事依赖，则不独天职有忝，更非久远之图，应视时机递进，以备接回自办；此种工作，可分三期：第一期，国人应参与校务，供给意见，相助为理；第二期，国人应有实际之担负，筹措一部分经费；第三期，应勉力自立，使主权属诸国人。其许尹博士邀请者，即为实现第一期之工作，迨国人渐知教育重要，始为第二步进行。”〔30〕

在其三期的计划中，其实涉及的问题主要就是两点：一是华人对校务的管理，二是经济上的自立。这两点在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也是被关注且需解决的问题，所以说岭南的收回自办，可视为基督教教育的先行者。

第一期中除钟荣光外，岭南还有一批华人教职员，其中陈辑伍在钟之后，接任汉文总教习的职务，在岭南服务逾二十年；廖德山医生既协助林安德（A.H.Woods）为岭南校医，又任教中文课程。他们在钟施行其一系列工作时给予支持和助力，从而形成岭南早期的一支华人基督教教育家的队伍。

到1915年后岭南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开始由国外留学归来，加入岭南成为新一代的华人基督教教育家，在岭南、广东甚至国内外的基督教教育界崭露头角。

第二期中，也是华人自立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在经济上的自立。早期基督教大学资金都来自国外捐助，岭南也不例外，学校的主导权自然也掌握在外国人手里。钟荣光力图改变此种状况，他利用自己在广州的交际圈，在好友江孔殷的帮助下，寻求政府和社会力量的支持。1908年7月3日，在学期的最后一天，岭南举办了一个大型的筹款活动，钟荣光邀请学生家长 and 当地政府官员参加，由于之前的努力，这次筹款活动获得了成功，1909年所筹款项用于建筑中学部第一宿舍。这次活动的成功极大地鼓励了钟荣光在华人中筹措经费的信心。1909年钟被任命为中国教务长，事实上负责向华人筹款的工作。1912年民国成立后钟出任广东都督府教育司长。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并在美洲各地组织岭南共进会达二十几处，为岭南筹款，收获颇丰。至1914年华人捐款达146,500元，虽然相比于美国人所捐的519,500元为少，但在当时中国的基督教学校中已是华人捐款最多的学校。^[31]

1914-1916年钟荣光在南北美洲各处，先后成立“岭南共进会”三十多处，为岭南筹款。^[32]1917年钟荣光任岭南大学副监督，并开始在南洋的华侨中筹款，得到华侨的支持，岭南也派出林耀祥为校长在新加坡帮助华侨兴办学校。1918年华侨资助的第一座岭南建筑落成，名为“张弼士堂”，由苏门答蜡的张秩摺夫人提供资金。此后岭南校园有多座华侨资助的建筑建成。1921年完全由中国人提供经济来源的农科大学成立，岭南同时又开辟了另一个资金的主要来源，即从中国政府获得资金注入。^[33]

钟所筹款项主要用于建筑。而学校的经常费华人也开始承担，一是通过学费收入，一是通过筹款。1915年岭南学生发起第一次学生筹款活动，从下表所示资料来看，岭南建校康乐后十年间经费收入增加最多的是学费收入，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岭南招收的学生在不断增加，学校在华南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加。那么此次的筹款成果如何呢？据不完全统计，共筹得款项8000余元。^[34]从历年校刊资料

来看，学生的筹款活动还有多次，1918年4月的一次捐款中捐得港币17855元。因为后期学生的家庭出身更为优越，筹款的能力更强。

岭南常经费表：^[35]

	1904年	1914年
常经费	29700元	147700元
学生学费收入	8500元	78100元
美国人捐助数	11800元	17700元
中国人捐助数	无	无
不敷数	9400元	51900元

至1927年岭南收回自办前，岭南的财政已不需完全依赖外国的资金支持，华人在其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这是岭南能够顺利实现自办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这是与华人基督教教育家尤其是钟荣光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

四、三级体系的形成

从格致书院到岭南学堂到岭南学校到岭南大学，在广东这个区域，基督教教育由传教教育发展为现代教育的主要指标之一的专业化教育体系终于形成。1924年元旦，孙中山到岭南大学参观，并给岭大新生作了一场讲演，称赞岭大“在广东可以说是第一，就是在中国西南各省，也可算是独一无二”，对岭大的“规模宏大、修理整齐、教育良善”深表赞赏。^[36]岭南大学作为此时广东地区实力最强的综合性大学无论对于基督教教育体系还是中国新式教育体系都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在广东基督教教育体系中，在岭南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建成之前，学校的教育系统主要为初等和少量的中等学校，因为学校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和培养传教人才，学校金字塔的顶端是神学院，中等学校的学生（除医学外）升学的途径只有神学一途，例如聿怀中学和道济中学就是为了给贝理神学院准备生源而开办的，培英中学的学生升学也是在本校的神学院。岭南大学的兴建为培养世俗性的高端西学人才提供了场所，适应中国社会的需求，这也是格致书院开办时广东士绅上书的原因之所在。

不过岭南大学在其初期仍不能摆脱生源的困境，因没有合格的生源，1888年开办后一直只能开办中等性质的教育，从美国来的专业大学教师如晏文士对于自己一直无法教授真正的大学课程耿耿于

怀,只能把大量的时间用于进行科学研究和实地的调查。1917年大学部正式开办后,虽然有附属中学的生源,但仍远远不够,其时广东本土的新式教育还处于初期阶段,无法提供合格的大学生源,岭南为开辟生源和保证一定的生源质量,与当时办有高中的基督教中学进行联络,承认这些学校的学生可以免试进入岭南大学学习,1918年时有培英、真光、培正、培道四校为联络中学,后来又增加磐光、华英(1936年)^[37]等校为联络中学,学校的生源有了一定的保障。由于在教学上的连贯性,加之学生入学上的优先条件,无形中基督教教育体系初、中、高三级体系形成,教外学校的学生由于在英文等科目上处于劣势,升学较难,这一体系使基督教教育内部的升迁通道更为单一和封闭。

在中国新式教育体系的形成中,岭南大学这一所基督教高等教育机构,既为广东本土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个示范,对于本土新式教育又是一个竞争的参照系,中国的新式教育体系的形成,走的是一条非常规式道路,最初兴办的主要是语言学院和实业学堂,与岭南大学这种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种状况的改变要到1924年后由广东几所高等学府合并而成的广东大学的成立,广东大学的成立从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岭南大学竞争的产物。

参考文献:

- [1]相关研究主要有:郭查理著,李瑞明译,岭南大学简史,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出版,1997;Dong Wang, *Managing God's Higher Learning: U.S.-China Cultural Encounter and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Lingnan University), 1888-1952, USA,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07.*
- [2]H.N. Noyes, *History of the South China Mission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 1845-1920*, Shanghai: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7:27.
- [3]岭南学校大观(布告第十四号).1917-11:2。
- [4][6][7][20][33]岭南大学简史:9,14,21,49,52-53。
- [5]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9:447.
- [8]李圣华,本校简史,广州培英中学七十周年暨香港分校十二周年纪念特刊,1949:4-5。刘心慈,校祖那夏理女士传略,真光中学、真光小学建校七十五周年纪念特刊,1947-6-16:14。
- [9][25]朱有猷、高时良主编,简又文记岭南大学之创始时期,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524,542。
- [10][17]李熙斌,私立岭南大学史略,私立岭南大学建校康乐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9-12:3-4,5-7。
- [11]钱树芬毕业后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法律博士,民国初年为参议院广东代表,广东名律师,日后长期担任岭南的校董。
- [12]陈廷甲毕业后留学美国,为美国西点陆军大学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学生。
- [13]朱有猷,高时良主编,简又文记岭南大学之创始时期,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528。
- [14]岭南学校大观(布告第十四号),1917-11,9。李熙斌,私立岭南大学史略附大事年表,私立岭南大学建校康乐二十五周年纪念册,1929-12:15-18。
- [15]黄菊艳主编,近代广东教育与岭南大学,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vi。
- [16]此处地址后来发展为岭南分校的西关小学。
- [18]岭南中学一九一八年度毕业录,1918,岭南学校布告第二十一号名册,1918-1919:1-4。
- [19]何名芳,“岭南”话沧桑,广州文史资料(第52辑),羊城杏坛忆旧,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201。
- [21]岭南大学年鉴,1925:94。
- [22]班友录,一九一八年甲班纪事,岭南学校壹九一六年班刊毕业录,1916:15-18,2。
- [23]岭南学生界(第三期),1904:28。
- [24]本班历年纪事,岭南学校壹九一六年班刊毕业录,1916:2。
- [26]何荫棠,附中将来之计划,民十七年之南大附中,1928:21。
- [27]李永锡,如何把南大附中达到尽善,岭中半月刊,1929年-3-15,20-29。
- [28]黎照寰,招观海,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事略,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1981:81。廖奉灵,回忆钟荣光校长,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1:152。
- [29]招观海,钟校长荣光博士生平事略,钟荣光纪念特刊,1943:1-9。
- [30]高冠天,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单行本,1927年,第4页。
- [31][34][35]岭南学生筹款纪念录,1915:7-8,19-20,6。
- [32]黎照寰,招观海,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事略,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1981:74。
- [36]大元帅对岭南学生欢迎会演说词,广州民国日报,1924-1-1,5。
- [37]南大承认本校为联络学校,华英校刊(第三十一期),1936-10-1,6。

[责任编辑:温开照]